



原著：前英国驻中国大使

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 武亦红等译

# 邓小平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傅惟本

邓小平传

[英] 理直德·伊文思 著

武市红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6 字数 201.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ISBN7—208—02364—6/D·425

## 中文版序言

50年代中期，一位年轻的英国绅士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政治参赞。他到中国后，最早干的几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传递回英国。那时的伊文思先生，对邓小平知之不多，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为邓小平的报告所深深吸引，并对邓小平本人产生了兴趣。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的伊文思先生，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伦敦，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巴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关注着邓小平。1984年至1988年，他担任了英国驻华大使，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为促进中英友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年伊文思先生完成了《邓小平传》（英文原名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将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尤其是对邓小平本人的了解展示给了广大读者。

在这部书中，伊文思先生按时间顺序分十五章，叙述了1904至1993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

由于本书作者是国外人士，其立场和观点与国内学术界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某些提法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仅供参考。另外，由于本书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间跨度大，内容上难免有不够准确之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为忠实于原著，除第十四、十五章个别地方作了些删节之外，翻译、编辑时只对明显错误的史实做了必要的订正。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姜淑萍（第一——三章）、于冰（第四——五章）、刘金田（第六章）、施肇域（第七章）。张爱茹（第八——九章）、王宁（第十章）、阎建琪（第十一章）、武市红（第十二——十三章及结论）、高屹（第十四——十五章）。

武市红负责全书译文的校订和最后统稿。

Richard Evans  
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根据 Hamish Hamilton 1993 年著作  
Copyright (C) 1993 by Richard Evans Copyright (C) 1996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itle Mori Agency, Inc. 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版权所有  
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esent contract it will not us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n any other work, including works compiled  
by itself,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prietor.

未经许可，不得引用

## 邓小平传

##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千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没人写过或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

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样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 80 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佛。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且仍然生活在他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两年以后，他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

---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

应为 1936 年。——译注

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

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士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1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



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爆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

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 20 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 1908 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了，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 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 12 月期间，有近一千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 年 6 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

开自由旗”。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的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忧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本人。

《邓小平传略》第3页。

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同上书，第452页。

同上书，第453页。

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

## 第二章 油印博士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太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那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

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 6.6 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孀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 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证据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 年 4 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 1921 年 10 月至 1922 年 2 月。周和邓 1921 年 5 月至 1922 年 2 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 1922 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

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他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很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他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他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大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审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都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1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以打击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

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他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样。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那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注释：

《邓小平传略》第3页。

同上书，第3—4页。



《华盛顿邮报》1980年8月31日。

《邓小平传略》第4页。

巴曼·杜勒斯：《在法国的日子》第31页。

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第702页。

同上书，第704页。

《邓小平传略》第4页。

《邓小平画册》第57页。

弗朗兹：《邓小平》第56页。

### 第三章 军阀和布尔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最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为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

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千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万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党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 1920 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 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 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 1931 年至 1935 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 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 1956 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 1937 年是这样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但他非常勇敢（在 30 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

---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 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

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六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

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0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人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内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这种有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着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

---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

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正直的人，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国，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注释：

斯宾塞：《现代中国研究》第 323 页。

《邓小平传略》第 5 页。

海伦·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 22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2 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5 页。

《剑桥史》第 12 卷，第 607 页。

《邓小平传略》第 5 页。



## 第四章 身处险境 1927—1931年

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1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被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吃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当众处死；在长沙，许多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商人也被杀掉。

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便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由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2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调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瞿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余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江。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

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结果共产党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笔损失：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俄国人并袭击了苏联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仍然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维汉。李与邓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刚被提升到政治局工作。现在，邓小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平常时期，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共产党在当时是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个人若是叛变了，会牵连到许多人。在共产党人要积极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内的安全地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就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去西南的同一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时间，邓小平结婚了。他的妻子张锡瑗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某个小根据地任过职。邓小平是什么时候。怎么与她相识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瑗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他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张锡瑗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调任新的工作了。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对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开了第六届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该次会议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

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攻击。他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一致。

经过整个6月份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谴责了“机会主义”（即所谓陈独秀执行的路线。陈未到会），但同时也谴责了“盲动主义”（即由瞿秋白下令发动的那种盲目的军事行动）。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六年以后，当毛泽东自己总结出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三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千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队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

---

此处有误。毛泽东是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完整的总结的。——译注

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

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旗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维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正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调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出师南宁试图缓解红八军的压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几年前就开始带领一伙农民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似乎是很大胆的行动，完全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没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后来邓自己也采纳了毛的政策。也许他意识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在百色周围重新开始活动。邓小平此时重返红七军并积极抓部队训练。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控制了约二十个县镇，共一百万人口。

如果党中央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是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只是边界不断发生一些变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他们也沦为所谓“立三路线”的牺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李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

---

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

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在李立三的宏伟计划中，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时期。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幸存人员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但韦拔群很快就掉头西行，使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部队失去一支力量（韦的部队后来被打败，韦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支军队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继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和张云逸尽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军队向柳州进军，但当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决定撤出战斗。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分裂，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现在不太清楚，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据军队中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团聚。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来到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这时离开了他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杂志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部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阵地指挥官，而且的确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当他后来在1931年回到江西后，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邓小平的部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于1931年被收编进中央红军。注释：

《剑桥史》第12卷，第656页。

《邓小平传略》第7页。

同上书，第8页。

同上书，第8页。

同上书，第 8 页。

参见袁任远《红色风暴》。

《邓小平传略》第 9 页。

弗朗兹：《邓小平》第 88 页。



## 第五章 长征 1931—1935 年

邓小平 1930 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迫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惩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 年 1 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瞿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瞿秋白被开除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立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 1 月中旬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 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 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 5 月份被捕，6 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

1931 年夏末，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 1931 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 1928 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

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 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样，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 1931 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 1931 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 1934 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 1931 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 1931 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 1929 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 年底至 1931 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清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 AB 团，而实际上他们可

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样形容他们）。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百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样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盲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任何其他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样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样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

---

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

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

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祥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调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了）；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接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计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

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稼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

---

应为主编。——译注

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

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

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

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远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

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邓小平传略》第9页。

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邓小平传略》第9页。

同上书，第10页。

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邓小平传略》，第10页。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同上书，第165页。

## 第六章 山中一兵 1935—1945 年

1935 年 8 月 1 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 1934 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 11 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 1932 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 1927 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 1933 年 1 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 年 12 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 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 年 7 月，



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样，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样，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

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

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伤寒而且很重，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这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十六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并且表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一阶段，邓既是一名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了解军队实际，而不会对军队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像毛一样，邓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红军和八路军这一政治军事体系，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最高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外，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连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负责的范围很广，从其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续了八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拥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十九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拥有近一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十二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仅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的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扩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到1945年春，它已经增加到将近九十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四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至一百二十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日军敌后。这是共产党在战

---

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原注

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被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許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转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一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原则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农赖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份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在根据地共产党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因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的。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样，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115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但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已经去世的那位同志。邓在129师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于1892年，比邓大十二岁。二十年代初，在他参加共产党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党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

---

邓小平是接替129师原政委张浩的，张浩当时只是生病没有去世。——译注

长征时任红一军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带着一副帅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治。他和邓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位于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山高势险”，“易守难攻”。邓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也就是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个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但就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129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首先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也为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创造了条件。不管有无延安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产生了双重的后果。百团大战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当许多坏消息（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充斥一时的时候，它使得全国的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力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

“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

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 559 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 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 1942 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 129 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他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颌和有一双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一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 40 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 129 师在 1941 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他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 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

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江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年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

---

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

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

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是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特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

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广“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0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

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注释：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

本杰明·扬普：《从革命到政治》第224页。

《邓小平传略》第14页。

同上书，第11页。

同上书，第12页。

《剑桥史》第13卷，第608页。

肯培：《遵义会议与毛权力的进一步崛起》。

同上书，第131页。

《邓小平画册》第65页标题。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19 页。

##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以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迫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荷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样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问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

---

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

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后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0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在必须过正”。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

为厂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改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0：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

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

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彻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

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绝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利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的支持。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前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幸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

---

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

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个兵团司令则被打死。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 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 月 20 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 7 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 10 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 年 11 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大多数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 12 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

---

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

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伯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土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上匪，并以北方根据地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样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到1952年进一步降到10%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上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修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0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上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怕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上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受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调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8—1169页；第1173页；第一卷，第17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30—1231 页。

《邓小平传略》第 17 页。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75—676 页。

施拉姆：《毛泽东传略》，第 191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6 页。

## 第八章 百花运动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颔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从房子内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的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过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

---

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  
——原注

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 1956 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 1950 年 10 月开始直到 1953 年 6 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 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 40 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 1953 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 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 50 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 20 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 40 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 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 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 1949 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

---

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

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 1943 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

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土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

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 1952 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 1949 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 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 1953 年 6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 8 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 10 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一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和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 年 9 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 129 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 1952 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 8 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 年 6 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 1953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的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 年 12 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 1955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 1956 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 1945 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态。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 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

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



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在 1956 年 9 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 1958 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已；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 1945 年的状况同它在 1956 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 1949 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 and 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

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11）。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似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改。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

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后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2)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样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13)。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

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法为由，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文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

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普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14）。

多年以后，他但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15）。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

注释：

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同上书，第32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同上书，第245—246页。

（11）同上书，第235页。

（12）《邓小平传略》第23页。

（13）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15）同上书，第273页。

## 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 年

从 1956 年 9 月获得升职一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样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 1958 年 5 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

从 1958 年到 1962 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 1957 年 12 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 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 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 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

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摒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被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

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

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他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已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



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样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许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样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

---

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千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问应当坦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样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调，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迫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

---

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

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0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治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0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千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

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

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样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

---

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

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鲁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三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二十六国党代表会议和八十一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八周的争论期

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

---

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



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千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

---

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

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于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剑桥史》第15卷，第38—39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赞格瑞尔：《中苏论战》，第365页。

鲍威尔和费尔班屯：《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1959》，第59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4页。

## 第十章 走资派 1965—1973 年

假如毛泽东在 1966 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 1966 年持续到 1969 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 1969 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 50 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 5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 60 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样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

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 1965 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 60 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 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 50 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 1930 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或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 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 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 50 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青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 60 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 1963 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 1900 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 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中共中央

---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

机关于 1933 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 1934—1956 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 60 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 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 1966 年 5 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 1959 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 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 1965 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了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

---

此处有误。1938 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5 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译注

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

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了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

---

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

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未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

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样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师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到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势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

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0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0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11)。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12)。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13)。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聚。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

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14）。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0页。

《剑桥史》第15卷，第140页。

赖斯：《毛之路》第 252 页。

同上书，第 264 页。

齐欣（音译）：《邓小平》，第 56—64 页。

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 266—267 页。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 35 页。

《华盛顿邮报》，1980 年 8 月 31 日。

科克：《邓小平》，第 23 页。

(11) 聂荣臻：《红星之下》第 747 页。

(12) 同上书。

(13) 《邓小平传略》第 50 页。

(14) 同上书。

##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他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划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

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 1972 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于。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朝向，毛泽东在 1972 年底 1973 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 60 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 1950 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 1976 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 1966 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



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 12 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已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对她很好（例如，在 50 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 1973 年夏季至 1974 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 年 8 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 1945 年、刘少奇 1956 年、林彪 1969 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 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 1959 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

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

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 1963 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坦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 1974 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警。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 年代和 60 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 20 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 50 年代、60 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样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子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从周和邓 1974 年 4 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早在 195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间。”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译注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问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 1964 年至 1965 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

---

早在 195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间。”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译注

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大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0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

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的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

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端。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撤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

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3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章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悔改、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千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



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 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 年 9 月 8 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 月 9 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 9 月 19 日、29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 10 月 5 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 月 6 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剑桥史》第 15 卷，第 345 页。

同上书，第 350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6 页。

同上书，第 4 页。

《问题与研究》1979 年第 2 期，第 96 页。

---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

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 646 页。  
《邓小平画册》，第 97 页。  
伯纳维亚：《邓小平》第 97 页。

## 第十二章 处理善后 1976—1981 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平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

---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

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严重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伯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

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由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0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0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0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的“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几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

此处有误，应为儿子。——译注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千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三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情”（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交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 1956 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 年 7 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 1978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 年 9 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 年 3 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 50 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 1976 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 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安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 年夏末，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 1976 年 4 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 月 10 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诿、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

---

此处有误。邓小平 1956 年 9 月 16 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  
1978 年 12 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 1977 年 7 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此处按原文译出。——译注



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 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 1957 年以来所制定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 1975 年和 1976 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 1966 年 8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 11 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 11 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 1956 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

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

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 1949 年获得全国解放，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 年 8 月中国最新出版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 1978 年 12 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 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样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 1979 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倍。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 9 月的中央全会和 1980 年 3 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 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

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邓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支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

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魅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判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

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回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11）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同上书，第82页。

《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同上书，第166—172页。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同上书，第58页。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泊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他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

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入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棋，他认为，如果



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样，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少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调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

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国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他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悖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措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府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

---

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

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

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978 年到 1982 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 50 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1949 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邮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活。

第二阶段是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 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 年和 1985 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 50 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 1982 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 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 1949 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 1986 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 1986 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 1986 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 1987 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

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邓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 16、17 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 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 1978 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 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子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 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十多万兵力。80 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是从 1981 年 12 月里根就职到 1982 年 8 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

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 1982 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古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 1972 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 年和 1982 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大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 年 10 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 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样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牒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 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 9 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

---

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这一文件。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原注

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料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

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 1984 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 10 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 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 年 7 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 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

我还想请首脑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

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 年 6 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 1984 年 10 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11）

注释：

1987 年 5 月李先念同玛格丽特女王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7 页。

同上书，第 112 页。

同上书，第 152—153 页。

1981 年 9 月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白皮书·导言》，1984 年 9 月 26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1 页。

《白皮书·导言》1984 年 9 月 26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3 页。

同上书，第 61 页。

(11) 同上书，第 101—102 页。

## 第十四章 天安门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没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地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

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 and 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

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3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 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入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入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有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

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捕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怕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时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

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平，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样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末，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

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圈，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同上书，第70页。

同上书，第142页。

同上书，第181页。

同上书，第196页。

同上书，第229页。

##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1989—1993年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共产主义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江泽民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朋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

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己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那篇讲话，以及他提升了江泽民。因此，“六·四”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未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不过，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经常与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论改革之事。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漠不关心或表示反对，1991年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而一些全国性的报纸甚至不曾提到这篇文章。

1992年初，他开始南巡。巡视华中、华南、华东，包括他的话能很快被香港报道出去的地方。他访问了武汉、深圳特区、珠海和上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发表讲话。很快，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和一些引语出现在香港的报纸、电台和电视节目中。观看香港电视的成千上万华南观众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不久消息遍及全国各地。

从北京对此事反应的速度来看，中共领导阶层未经过太多的争议就已决定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了。2月21日，邓小平作南巡的最后讲话。28日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大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两个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在一段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这段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这些话很清楚：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

在政治上，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最后，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讲话在夏初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了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邓小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的成功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定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比喻成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把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加速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会最后一天，当邓小平在邓榕小心的搀扶下缓慢地经过会见大厅时，他完全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邓小平没作任何发言，也没呆很久，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的热爱比对舵手毛泽东更胜一筹。代表们将会很想念他。因为，代表们知道，有许多人帮助过邓小平设计过中国现代化，并创建起一套基础理论，但是，他们也知道邓小平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如果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将会怎么样？确实，在新的领导层中，或者说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无论在声望、经验或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人能跟邓小平相比。

#### 注释：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3页。

